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七十九本，第一分
出版日期：民國九十七年三月

清代儒者的全神堂—— 《國史儒林傳》與道光年間顧祠祭的成立^{*}

王汎森^{**}

清代道光年間（鴉片戰爭之後），北京大批京官發起顧祠祭，這個祭祠活動持續了七、八十年。本文是以顧炎武祠的建立為引子，藉《國史儒林傳》成書過程，重新檢討嘉、道年間思想文化歷史中，顧炎武為清朝第一儒者的論斷是如何形成的；同時也討論了在形成顧炎武崇拜的過程中，士大夫圈編織了一個似有若無的「全神堂」，而官方功令、政治忌諱又如何影響清代儒者全神堂的安排。全文呈現出從嘉慶到道光，政治忌諱之逐步鬆弛與士人世界相應的變化，以及官方意識形態、學術、思想、社會幾種力量互相交織、轉變的情形。

關鍵詞：顧炎武祠 國史儒林傳

^{*} 此文曾經陳鴻森兄提供許多寶貴的修改意見，特此致謝。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清代國史館修儒林傳是從清嘉慶中期阮元（1764-1849）編輯《擬儒林傳稿》才開始的，¹ 我們可以說他開始了清代儒者「全神堂」（pantheon）的安排。誰被收入這個全神堂以及他們在這個全神堂中的位次，一方面反映了時代的情狀及士人世界的輿論，另方面也對學風的發展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全神堂的位次中，最引起各方面矚目的是對顧炎武（1613-1682）的安排，他的地位如何？人們從何種角度推崇他？對清代後期的士人世界具有很高的指標性意義。我最初是想探討道光二十三年（1843）北京士人的一個突出的舉動——一群對時局非常敏感的讀書人合力建造顧炎武祠，定期會祭，這個會祭行動持續超過七十年。推動建祠的一群京官用來說服時人的一個主要論據是，當代大儒阮元在他所編的《國史儒林傳》中以顧炎武為清朝儒者第一。但事實上那只是一個傳言，為了釐清這個傳言的形成，並推敲道光年間在內憂外患的新局面下，士人世界如何憑藉官方權威，標舉他們所期望塑造的英雄人物，故先撰此篇，作為將來寫顧祠會祭考的引子。

— .

在清初，不管是三大儒或四大儒的名號，都不包括顧炎武²（當然顧氏的著作很快地就被各方士人所崇重）。值得注意的是在道光年間，也就是距明清易代約兩百年的時間，興起了一股聲勢浩大的顧炎武崇拜；道光二十三年一群京官在北京慈仁寺為顧炎武建祠，每年祭祀三次。顧祠祭祀活動持續逾七十年，一直到民國初年祭祀活動仍然在進行。

發起建造顧炎武祠的主將是何紹基（1799-1873）等一批在北京相當活躍的京官，促使他們建祠崇拜的原因相當多，譬如清朝在鴉片戰爭的挫敗使得士人們渴望摸索一個新的學術方向，此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他們聽說阮元在他纂修的《國史儒林傳》中以顧炎武居首，這代表官方——而不是一般士人——對顧氏的最高肯定。此後，阮元的《國史儒林傳》以顧炎武居首之說便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重複述說，作為支持顧炎武崇拜的重要案據。

¹ 在此之前，陳壽祺曾一度著手纂輯，但因嘉慶十五年秋陳氏丁大父憂，去職中輟，其已纂修傳記若干，今已不得而詳。

² 何冠彪，〈黃宗義、顧炎武、王夫之合稱清初三大儒考——兼說清初四大儒及五大儒的成員〉，氏著，《明清人物與著述》（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6），頁49-63。

何紹基的〈顧先生祠〉詩中是這樣說的：

欽惟純廟年，四庫盛編纂。萬軸歸文淵，千士萃秘院。儀徵實後至，草創儒林傳。論學采源流，全編有冕弁。諸儒始相驚，乙覽大稱善阮師撰《國史儒林傳》，以先生居首。元氣入人心，史筆非私擅。……先生冠儒林，狂瀾植堰壩。……³

此處應特別強調由詩中「諸儒始相驚」一句，可以看出當時士人們對顧炎武是本朝儒林之首這個論斷何等的驚訝。

清代國史之有儒林傳由阮元開始（疇人傳、文苑傳亦然）。清嘉慶十四年（1809）九月，時任浙江巡撫的阮元因為劉鳳誥（1760-1830）科場案被控包庇而解職返京、靜待發落，擔任翰林院侍講。阮元在此之前兩度擔任浙江巡撫，前後長達十年，在當時的士人世界享有極高的聲望，我們可以說，他是繼畢沅（1730-1797）、翁方綱（1733-1818）等人之後，學術世界的宗主人物。阮元建議，國史中的儒林、文苑傳不應只取皇史宬中所收藏的資料作為編修的依據，應該移文各省，求草澤遺佚，以廣未備。⁴隔年十月，阮元自願兼國史館總纂，輯儒林傳。在阮元著手儒林傳之前一百多年，史館曾經幾度作輟。乾隆三十年（1765）重開史館，此後成為常設機構，⁵但是儒林傳始終未有纂輯。原因之一是國史傳記按例要引據官書檔案，而儒者通常沒有這些材料可為案據，故清初以來，名儒輩出，但儒林傳無從修纂。阮元為了克服這一個先天的困難，提倡不應當拘守官書檔案之有無，而應向各方徵求材料。為了做到像其他國史館本傳之言必有據，他決定模仿全祖望（1705-1755）集句成篇的辦法，每段文字皆註明出處，表示言必有據。國史館總裁同意這個作法，遂奏明開辦。⁶

阮元纂《擬儒林傳稿》時，持一個相當重要的宗旨。他認為講經者不可不立品行，講學者不能不治經史，故不再劃分儒林與道學，而是將二者合而為一，這與當時獨重經學考證而菲薄宋儒道學的風氣，大有不同。故龔自珍〈阮尚書年譜

³ 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頁113-114。案：此詩在《年譜》中作〈何紹基顧先生祠詩〉，在《東洲草堂詩鈔》（收入《何紹基詩文集》〔長沙：岳麓書社，1992〕）中作〈別顧先生祠〉。本文皆引《年譜》，故通篇題作〈顧先生祠〉詩。

⁴ 王章濤，《阮元年譜》（合肥：黃山書社，2003），頁506。

⁵ 喬治忠，〈清代國史館考述〉，《文史》（北京）39（1994）：183。

⁶ 繆荃孫，〈國史儒林文苑兩傳始末〉，收入《藝風堂文漫存》（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稿三，頁16-18。

第一序〉中說阮氏「固已匯漢宋之全」。⁷ 不過阮氏早、晚年對宋學的態度，仍有微妙不同，大抵他愈到後期，愈能正面肯定宋學。阮元在決定編纂儒林傳時，頗與臧庸（1766-1834）、焦循（1763-1820）等他所熟悉的學者商酌撰寫義例。焦循在〈國史儒林文苑傳議〉中提出七條原則：一曰徵實，二曰長編，三曰兼收，四曰鑑別，五曰詳載，六曰公論，七曰附見。⁸ 臧庸也提出了一些看法。焦循提出的「徵實」、「公論」原則，被阮元所採納，此後阮元不斷地與師友往返通信，討論撰寫儒林、文苑兩傳應該收納的對象及其他事宜。譬如他在〈與陳恭甫書〉上問：「生近到史館，總輯儒林、文苑兩傳，閩中宜入傳者何人度可入十餘人耳，望錄寄，切切。」⁹ 傅增湘（1872-1949）藏《朱少河雜著稿本》便收有嘉慶十七年（1812）〈與阮伯元閣學論修儒林傳書〉。¹⁰ 嘉慶十六年（1811）八月，阮元被任命為漕運總督而離開北京，當時儒林傳仍未完全定稿，文苑傳則只創稿而尚未完成，阮元將稿本交給國史館，¹¹ 但此後他仍然不斷關心此事，而且也不時有人給他出各種意見。¹²

在清朝，能被宣付國史館立傳，本身即是一種至高的榮譽（事實上有不少宣付立傳的人來不及立傳）。因為阮元的儒林傳是清代的創舉，是清代官方第一次為本朝儒者排定他們在「全神堂」中的位次，是否被排入這個「全神堂」，以及在這個全神堂中居何種地位，很自然地成為士人世界所關心的焦點，因此不斷地有人給阮元寫信表示意見，而且在誰入誰出之間，意見雜出。臧庸在嘉慶十六年寫信給阮元，從信的意思看來，臧庸高祖臧琳原先是被考慮納入儒林傳的，但因有人向阮元表示臧琳的《經義雜記》曾經子孫潤色，故阮氏對是否將臧琳列入儒

⁷ 龔自珍著，王佩誥校，《龔自珍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227。

⁸ 焦循，《雕菰集》（臺北：鼎文書局，1977），卷一二，頁181-186。

⁹ 陳鴻森，〈阮元筆經室遺文輯存〉，《大陸雜誌》103.5（2001）：18。

¹⁰ 見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卷一七；轉引自王章濤，《阮元年譜》，頁528。

¹¹ 王章濤，《阮元年譜》，頁554。

¹² 王章濤，《阮元年譜》頁557記載，嘉慶十七年九月，「張其錦拜謁阮元于淮安，將凌廷堪部份遺稿呈交阮元，阮元親加校訂，謀付刊刻」。張氏編凌氏遺書，原擬攜往北京獻諸史館，以備儒林傳之采擇，中途呈阮元。頁570提到：阮元向張鑒出示《儒林傳稿》本，經商榷應增入應潛齋、張簡庵諸人。但是阮元主意時時改變，「是秋，再至薊門，吾友林太史茗齋同年告余，公前議已變易，然則若（鄭）芷畦諸人不入，未可知，其不遇于生前者，且將不遇于身後歟！」而且儒林傳可以隨時補材料，如明末清初之嚴衍，張鑒購得嚴衍題陳松圓畫卷，以為可補《儒林傳》中嚴衍傳之未備，故跋寄阮元；見王章濤，《阮元年譜》，頁659。

林傳，頗感躊躇。臧庸則上書阮元，認為「子孫潤色之說乃忌者有意中傷」，臧氏信中勸阮元勿輕信外間流言，亟盼史館仍將臧琳列入。¹³ 臧庸與阮氏關係很深，《經籍纂詁》事實上是由臧氏擔任總纂，對其先祖能否被收入儒林傳之事猶需如此爭辯，足見當時人對於是否採「公論」一事相當認真。臧庸的抗議是有效的。後來阮元將臧琳寫入儒林傳，以臧庸為附。¹⁴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張惠言（1761-1802）。阮元的《儒林傳稿》中收有張惠言，但當他將《傳稿》交出之後，某尚書認為張惠言的著作違背朱熹（1130-1200）的註釋，而將〈張惠言傳〉刪去，一時士論大為不平，主張要與張惠言之弟張宛鄰（琦）偏詣諸史官抗爭，宛鄰不肯，說：「先兄宜入儒林與否，將來自有定論，若為此求入，即與奔競何異，非先兄意也。」¹⁵ 由臧琳及張惠言之是否收入儒林傳，不但引來子孫的抗議，甚至要聯合士人集體抗爭，可見能否進入這個「全神堂」在當時士大夫心目中的重要性！

趙翼（1727-1814）說「男兒生墮地，例須一篇傳」，¹⁶ 在國史館能有一篇傳，揚名後世，對子孫而言是莫大的光榮，有些子孫便將國史館中的本傳依科舉硃卷式樣刊印，在親友之間散發。¹⁷ 儀徵劉氏因為祖孫三代皆列名儒林傳，大門屏風上題有一聯曰：「紅豆三傳，儒門趾美。青藜四照，寶樹聯芳。」¹⁸

在清代士人眼中，儒林傳的地位遠遠高於文苑傳，故當時人很在意先人究竟被收入儒林傳還是文苑傳。汪喜孫（1786-1848）曾寄函王念孫（1744-1832），請

¹³ 臧庸，〈上阮雲臺侍講書〉，見《拜經堂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997〕，集部，別集類，第1491冊），頁579-580。按：有關臧琳《經義雜記》是否為「子孫潤色」一事，近來陳鴻森〈臧庸年譜〉嘉慶十五、十六年條有詳細的討論，文載《中國經學·第二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¹⁴ 阮元，〈儒林傳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537冊），〈目錄〉，頁2。

¹⁵ 〈國史儒林文苑兩傳始末〉，收入《藝風堂文漫存·稿三》，頁17。

¹⁶ 趙翼，〈甌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二三，〈偶書〉，頁476。

¹⁷ 梅鶴孫的《青谿舊屋儀徵劉氏五世小記》上說：「劉氏自孟瞻先生並恭甫先生，三世樸學傳家，幼學之士，無不奉為大師，比之高郵王氏，吳門惠氏，祖孫三世皆由清廷宣付國史館，列入儒林傳，士林莫不榮之。記得在外家書架上，檢到當時印刷的《儒林傳稿》數冊，黃面硃書，其格式與硃卷類似，是分贈世、姻、年、學、誼各家未用完的，……內容先刻上諭，後附《儒林傳稿》一長篇，俱是印紅色的，並無其他記載。」見梅鶴孫著，梅英超整理，《青谿舊屋儀徵劉氏五世小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68-70。

¹⁸ 同前書，頁70。

求王氏寫信給阮元，將乃父汪中（1744-1794）由文苑傳改列儒林傳。汪氏〈致王念孫書二〉記載：

以史館纂錄文苑傳，先君行事與袁江寧、蔣苕生太史同列，懼無以定千秋之公論，哀求老伯大人，寄書漕督阮公辨正之。……阮公及史館從事俱諸公，莫不信從執事，倘蒙致書阮公，屬其改入儒林，庶幾先君身後之名，自執事一言論定，可以信今，可以傳後。¹⁹

汪喜孫不欲乃父與袁枚、蔣士銓同列，僅以文士傳名，致其學術湮沒不彰。因此阮元當時雖已離任館職，改官漕督，但汪喜孫仍盼藉由王念孫對阮元的影響力，由阮元囑史館將汪中改列儒林。因為阮元輯《儒林傳稿》是一件眾所矚目的工作，所以它的內容、它在史館中的情形，似乎頗由史官私自談論傳述而為外人所知，否則便不能解釋有關臧琳、張惠言、汪中的三件爭論了。我們所知道的是當時已經有人開始傳播此稿。參與儒林傳分纂的錢昌齡（恬齋）即曾將所錄《儒林傳稿》借給錢泰吉（1791-1863）抄寫：

嘉慶甲戌（1814），族子恬齋由翰林出守澱江，過家上冢，泰吉鈔得《儒林傳稿》，主其事者儀徵阮公者，恬齋亦與分纂也。文苑則尚未彙稿。後數年于汪小米處見之，潘梧君謫人因借鈔其副。昨歲梧君下世，其冊歸唐氏，泰吉乃屬鍾署香、潘稻孫為鈔此本。²⁰

從前引文可以看出，除了錢泰吉的抄本外，陸續還有其他人傳抄錄副。

阮元動手纂輯儒林傳是在嘉慶中期，當時清廷對明清易代的忌諱處在一個相當模糊的狀態。這種模糊狀態是由三種力量交織而成。乾隆四十一年（1776）頒布過《勝朝殉節諸臣錄》，正式公開褒獎殉明的忠良，這個舉動的功用不可小看，許多原先深諱不彰的前明殉節忠臣文集重新出版，並且經常在書前引用《勝朝殉節諸臣錄》前的那一道上諭作為護身符。但是緊張的空氣仍然存在，許多人害怕政治氣候不知什麼時候還會變化。有意思的是，嘉慶皇帝竟然不知道乾隆曾有過前述的寬鬆政策。

《水窗春嘯》記載嘉慶中修《明鑒》，編纂者為戚容台，其中述及明清易代兵事時偶犯忌諱，嘉慶閱後大怒，將戚氏下獄。松筠（1754-1835）召對之時，嘉

¹⁹ 楊晉龍主編，《汪喜孫著作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上冊，頁184。

²⁰ 錢泰吉，《甘泉鄉人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1519冊），卷六，〈文苑傳跋〉，頁19-20。

慶談及此事，松筠遂上奏曰：「純皇帝有明諭以前明之事宜直書，不當避忌。」嘉慶大為驚異說：「先帝果有是書？」於是命檢《乾隆實錄》，果然發現這一道諭旨，其怒始息。²¹ 由此一例可以看出官方歷史記憶傳遞之不易，在父子兩代統治者之間，如非經大臣提醒，兒子已經不復記憶父親一代對明清之際的政治忌諱所採取的態度了，更何況是一般士人。經過乾隆後期的幾道上諭，及《勝朝殉節諸臣錄》、《貳臣傳》、《逆臣傳》等的洗禮，人們逐漸確立一種評論清初人物的新標準：能始終堅持志節者為高，投降或仕清者為下，而不管他們是否對清朝有過重大的貢獻。但是政治世界的奇詭之處在於不確定性所帶來的恐懼，誰知道在異族政權之下，統治者何時要翻臉。纂輯清代儒林傳時，自然不能略過清初儒者，所以也就不能不接觸到政治忌諱的問題。幫助阮元搜集史料的張鑒（1768-1850）在一封信中提醒他的老師：「寧都三魏當歸文苑，敬聞命矣。但魏禮諸人事可無礙否？」²² 可見張鑒對此仍然相當猶豫。

關於阮元的《儒林傳稿》，我先寫到這裏。現在我們回到本文一開頭所說的：阮元的《儒林傳稿》究竟是不是以顧亭林為首？如果不是，何以後來人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稱顧亭林為《國史儒林傳》之首？為什麼《國史儒林傳》是否以顧氏為首在當時士林中如此重要？

清代官方的權威有一個升降的歷史，在嘉、道年間，官方仍有很大的權威，官定文書的影響力仍然非常大，當時士人常用來判斷一位儒者份量的權威，是《四庫全書》所收著作數量之大小，以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下簡稱《四庫提要》）中之評論。在道光以後，《國史儒林傳》中是否有傳？評價如何？則至為重要。《國史儒林傳》一方面是以國史館之名義纂輯，一方面是出自當時已獲學界宗主地位的大儒之手，其重要性更高。

二．

然而，阮元《儒林傳稿》的刊本事實上並未以顧亭林居首。嘉慶十七年阮元《儒林傳稿》其實是以顧棟高（1679-1759）居首，接著才按清初以來諸儒的年代

²¹ 歐陽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嘯》（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58。

²² 張鑒，〈答阮侍郎師書〉，見《冬青館甲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1492冊），卷五，頁5-6。魏禮、魏禧拒不應試仕清，參見謝正光、范金民，《明遺民錄彙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下冊，頁1186。

先後排列，顧炎武被排到第八的位置。²³ 這個刻本確實是阮元出任漕運總督前匆匆移交史館的，故序中言「嘉慶壬申（1812）八月，漕運總督阮元交出前在翰林院侍講任內撰稿」。²⁴

阮元一開始在〈凡例〉中即說明他的基本態度是不收入貳臣及行止可議的儒者。至於王夫之（1619-1692）、黃宗羲（1610-1695）等曾在南明任職且清代未曾入仕者，因為其著作被收入《四庫全書》，「列為國朝之書」，而且多受四庫館臣的褒揚，故決定收入。他並一再強調這只是一份未定稿，「如同館諸友所見者，不妨酌補」。他強調在纂輯過程中，「凡各儒傳語皆採之載籍，接續成文，雙注各句之下，以記來歷，不敢杜撰一字。……私家狀述，涉於私譽者，謹遵館例，一字不錄。至於各句雙注，將來進呈御覽時，應否刪去，候總裁核定」。²⁵

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出奇料理」，把乾隆年間的顧棟高列為傳首，附以陳祖範、吳鼎、梁錫璣，因為乾隆三十年（1765）九月十五日降諭辦儒林傳時曾說：「且如儒林，亦史傳之所必及，果其經明學粹，雖韋布不遺，又豈可拘於品位，使近日如顧棟高輩，終於淹沒無聞耶！」²⁶ 阮元這個特殊的安排除了為表示尊重乾隆辦理儒林傳之上諭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顧、陳、吳、梁都是乾隆辦理「經學特科」所取人物，²⁷ 把他們放在一起，更隆重地表示尊重朝廷功令之意。除顧棟高及其附傳諸人，其餘入傳者悉依生卒年先後排列，故在這份《儒林傳稿》中，顧炎武的位次還在孫奇逢（1584-1675）、李顥（1627-1705）、黃宗羲、王夫之、高愈、謝文淳（1612-1682）等人之後。這個排列方式阮元曾徵詢僚友意見，故張鑒在一封信中說「以顧作傳首，而附吳、梁以下，此千古不刊定論」。²⁸ 張氏所言之顧即顧棟高，吳為吳鼎，梁為梁錫璣。這麼奇特的安排，張鑒卻認為是「千古不刊定論」，足見乾隆三十年那一道諭旨的威力。

從這份《傳稿》實在看不出當時及後來士人一再宣稱的：本朝儒林傳之首是顧炎武。但是通讀《傳稿》，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在〈顧炎武傳〉中有兩句不尋常

²³ 《儒林傳稿》，〈目錄〉，頁1。

²⁴ 同前書，〈序〉，頁3。

²⁵ 同前書，〈凡例〉，頁1-2。

²⁶ 同前書，卷一，〈顧棟高傳〉，頁1。

²⁷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三五，〈文教〉；轉引自林存陽，《清初三禮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302。

²⁸ 〈答阮侍郎師書〉，《冬青館甲集》卷五，頁5。

的評價，即「國朝稱學有根柢者，以炎武為最」，並注明出於「提要」，²⁹ 也就是說它是依據《四庫提要》中的評價，並非出於阮氏杜撰。而通覽《傳稿》，只有〈顧炎武傳〉有如此高的評價。

《四庫提要》中究竟是怎麼說的？《四庫提要》中收入顧炎武的著作二十二種，有的收入正編，有的則列於存目。我通檢這些提要，館臣們確實對顧氏的考證著作大加讚賞，但顧氏後來為人們所稱美的經世之書，卻大遭貶抑。³⁰ 可以看出在考證學如日中天時，顧炎武為人們所看重的是考證之書而非經濟之論，其中尤以《左傳杜解補正》三卷最被稱道，而阮元那兩句話便是從《左傳杜解補正》的「提要」而來。那一條提要是這樣說的：

炎武一名絳，字寧人，博極群書，精於考證，國初稱學有根柢者，以炎武為最。³¹

細心的讀者會很快地發現，《四庫提要》中作「國初」，而阮元作「國朝」，一字之差，頗具意義，此後各種版本的列傳皆用「清朝」（如《清史列傳》），一直到民國的《清史稿》〈顧炎武傳〉才又改回「國初」。³² 由這一字之異，我們可以推測阮元同時在做兩件事：尊崇官方的功令，如引乾隆上諭而以顧棟高為傳首，如引《四庫提要》的評價，以《四庫全書》是否收存為去取之斷，而且在編輯《皇清經解》時，以四庫館臣一再稱道的《左傳杜解補正》為第一部書。但是他也同時加入自己的評價，把顧炎武由「國初」的第一大儒改為「國朝」第一大儒。

由阮元的種種安排可以看出他顯然有兩重考慮：第一是誰的學問與道德水準夠資格放進儒林傳？第二是怎樣安排比較符合政治正確？關於第二個問題，積極的方面是最高統治者怎麼指示，消極的方面是如何處理政治忌諱的問題，尤其是對那些生長於明清易代時期，不仕清朝，甚至反抗過清朝的人。阮元在《傳稿》

²⁹ 《儒林傳稿》，頁22所引「提要」在永瑤、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春秋類》卷二八。

³⁰ 如對《日知錄》評道：「惟炎武生於明末，喜談經世之務，激於時事，慨然以復古為志。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觀所作〈音學五書後序〉，至謂『聖人復起，必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是豈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書序，乃盛稱其經濟，而以考據精詳為末務，殆非篤論矣。」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簡稱《四庫提要》，臺北：漢京出版事業公司，1981），子部，雜家類，卷一一九，總頁645。

³¹ 《四庫提要·經部·春秋類》卷二八，總頁162。

³² 趙爾巽等撰，啟功等點校，《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1977），卷四八一，頁13168。

中講到這些人時對他們忠明抗清多要作一番解釋，說明他是採取乾隆《貳臣傳》及《逆臣傳》的立場。阮元的思考過程我們並不瞭解，但他將《傳稿》送交史館時，心中顯然非常清楚，此稿只能代表他個人的意思，最後國史館還是要進呈皇帝御覽。想通過這道手續，當然不能不注意政治的忌諱。阮元當時仍屬待罪之身，對官方之功令自然更加謹慎小心，所以他寧可依據乾隆上諭，將從任何標準出發皆不宜放在傳首的顧棟高放在最前面。

阮元的《儒林傳稿》傳本極稀，目前比較容易見到的是《續修四庫全書》中用南京圖書館所藏的影印本，³³ 但是從道光年間開始，坊肆之間又出現了一種兩卷本的《國史儒林傳》，兩者之間到底有什麼關係？從道光以後，凡提到兩卷本的《國史儒林傳》，大抵認為即是阮元所撰，³⁴ 但是也有人覺察到兩者的關係相當複雜。署名仰彌所撰的〈阮文達學述〉中說，道光間所刊《國史儒林傳》，「然未審即其（阮元）原稿否？」³⁵ 孟森（1868-1938）〈清國史館列傳統編序〉：「又儒林、文苑兩傳，前無刊本，雖有一不甚明顯之國朝文苑儒林傳，亦簡略游疑，傳者亦不敢標為國史館稿，蓋早期未勘定之館傳也。」³⁶ 孟森在〈清史傳目通檢序〉中又說：「考清之有儒林傳，創意之者為阮文達公，……今坊刻國史舊儒林傳，雖未必即阮氏原文，猶可見初立儒林傳之義例。」³⁷

孟森用「有一不甚明顯之國朝文苑儒林傳」一語，最有斟酌。我推測是因為這部儒林文苑傳無作者、無刊者、無年代，在當時如一無頭公案，故說「不甚明顯」。連見聞廣博的孫殿起（1894-1958），都在《販書偶記》中的「《國史儒林傳》二卷，《文苑傳》二卷，《循吏傳》一卷，《賢良傳》二卷」條下註明「阮元撰，無刻書年月，約同治年間」。³⁸ 從書名及卷數看來，孟森與孫殿起所提到的是同一部書，只是孫氏所見到的是《國史四傳》本，將儒林、文苑與循吏、賢

³³ 關於這個刊本，《續修四庫全書》的編者註明是嘉慶刊本，但查考南京清涼山《續修四庫全書》據以影印的南京圖書館古籍部所藏原本（分為線裝兩冊，第一冊是卷一、二，第二冊是卷三、四），並沒有任何出版資料及收藏印記，只有一「南京圖書館藏」硃印，並無任何確證可以判定為嘉慶刊本，編者極可能是根據該書序於嘉慶十七年，故遽定為嘉慶刊本。

³⁴ 如周予同注皮錫瑞《經學歷史》，反覆引兩卷本阮元《國史儒林傳》。

³⁵ 周康燮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論集》（香港：存粹學社，1978），頁308。

³⁶ 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631。

³⁷ 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485-486。

³⁸ 孫殿起，《販書偶記》（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4），頁149-150。

良傳合刊。當時這類抄自國史館的書，常常分合不定。

兩卷本《國史儒林傳》傳本不豐，臺灣目前未聞有藏本，我在日本關西大學增田涉文庫及內藤湖南文庫中則曾見到。一部是內藤（1866-1934）於一九〇二年購自北京，書名為「《國史儒林傳》二卷，《國史文苑傳》二卷」，封面為內藤本人所書，書背上註明「內藤湖南舊藏」，則應是增田涉（1903-1977）所書；另一部在內藤本人的藏書中，只有「《國史儒林傳》二卷」，核對兩書，格式及內容完全一樣。此外，我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見到的兩種儒林傳，則是與循吏、文苑、賢良合刊的《國史四傳》本，但其儒林傳的版本與他處所見是一樣的。以上所見的《國史儒林傳》都未署作者，沒有刊者及刊刻年代，唯一的線索是書前都有阮元的〈擬國史儒林傳序〉，下註「國史傳無此序，今從《寧經室集》鈔出」，顯然是刻書者據阮集彙錄刻入，而非其所依據的傳抄本所有。³⁹

這部兩卷本《國史儒林傳》究竟刊於何時？孫殿起推測為同治刊本，關西大學的內藤湖南藏書編目者判斷為「清末一民初」刊本，恐怕是跟繆荃孫（1844-1919）的《國史儒林傳》聯想在一起而有此判斷。但是也有人判斷是道光年間刻本。看來最早的刻本不能早於道光二十四年（1844），但此後屢有刊刻。

如果認真比對阮元的《儒林傳稿》與兩卷本《國史儒林傳》，便會發現這一部被孫殿起定為阮撰的兩卷本，其實與《儒林傳稿》有同有不同。兩卷本顯然是以阮撰本為基礎修改而成，故內容字句大體相同，但在許多個別地方有修改。⁴⁰兩種本子比較明顯的差異是：第一，阮元的《儒林傳稿》，無「國史」二字，且聲明為擬稿，表明它並非國史館的定本，但兩卷本則逕名為「《國史儒林傳》」。第二，兩卷本完全刪去阮元原稿大量的引據出處，而且篇次有不同，人

³⁹ 在阮元之後，國史館臣對儒林傳續有增刪，在阮常生編《寧經室續集》（收入《叢書集成簡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第593冊），卷二，頁59-82中，有〈集傳錄存〉，是毛奇齡、沈國模、錢澄之、臧庸、閻循觀、汪紱、王鳴盛、丁杰、任大椿、孔廣森、張惠言、孔興燮、孔繼涵、顏光猷等人的傳，被史臣所刪去，阮常生將之收入《寧經室續集》中。而這些被刪的傳，在兩卷本《國史儒林傳》中，除閻循觀之外，都未收入。

⁴⁰ 以顧炎武傳為例，如《儒林傳稿》有「明贊善紹芳孫」，而《國史儒林傳》中刪去。《叢書集成續編》的《國史儒林傳》中有份繆荃孫編的《國史儒林傳》，一開始列了三種儒林傳目錄：第一種與阮元的《儒林傳稿》同，第二種是前面提到的兩卷本《國史儒林傳》目錄，第三種是光緒庚辰（1880）奏請派員重修的目錄，孫詒讓的跋尾顯示這一點，並指出這一次重修增加嘉慶之後學者，且大幅改動所收名單。見繆荃孫，《國史儒林傳》（收入《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4〕，史部，第36冊），總頁87。

物有增減，內容有潤飾、有增刪，而以刪去爲多，當然也有比較大幅的增改（〈孫奇逢傳〉）。第三，兩卷本的〈顧棟高傳〉有了大幅的刪改，完全刪去阮元在傳前所引的一大段清高宗的上諭，並依生卒年爲顧棟高重新排序。第四，兩卷本將《傳稿》改爲兩卷。第五，也是最重要的，兩卷本以顧炎武作爲傳首，並對其他傳記的順序有所調動，不再完全依時代先後排列。在兩卷本《國史儒林傳》中，顧炎武才是名符其實地居清朝儒林傳之首。

從阮元的《儒林傳稿》到兩卷本《國史儒林傳》，有一個複雜的過程：阮元將《傳稿》交出之後，即不會再回到史館任職。後來顧藹（1765-1832）到史館擔任提調，始將阮稿修改進呈，繆荃孫說時間當在嘉慶末年，但是何紹基的〈顧先生祠〉詩的改訂本說是嘉慶初年。案，顧藹於嘉慶七年（1802）中進士，而且阮元的《傳稿》是嘉慶十六年才交出，故何說顯然錯誤。⁴¹ 顧藹據稿立傳，改以顧炎武居首，史館總裁進呈時，將毛奇齡（1623-1713）由儒林傳改入文苑傳，並刪去沈國模（1575-1656）等十七人。因阮元所撰諸傳被史館刪棄後已非官書，故其子將被刪諸人的傳記收入阮元文集《擘經室續集》。

顧藹進呈本目前尚未得見，我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檔案中見到一種題爲〈儒林顧炎武傳〉，⁴² 上面有「舊傳」字樣，當是依據顧藹進呈本所抄立的，此傳的編排、內容，皆與兩卷本《國史儒林傳》相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封面的註記確實是以顧炎武居卷一的第一位，符合顧藹改以顧炎武居首之說。不過此傳中已經刪去《儒林傳稿》中的資料與出處，應該是後來改抄過的本子。

但是目前坊間所見兩卷本卻與此本又有微妙的不同，而這些不同正好都見之於故宮所藏的另一種〈儒林顧炎武傳〉。⁴³ 這一種傳稿對前者作了兩種工作：第一是將部份字句用白紙貼上，第二是以籤條對部份內容加以改正，而修改之後的內容即與今天所見兩卷本中之〈顧傳〉相符。在此一改定本的背面有兩方小圓印，印文爲「方印」、「蔡印」，顯然是姓方及姓蔡的兩位館臣所改。

這個發現與繆荃孫在〈國史儒林文苑兩傳始末〉一文中的描述一致。我推測繆荃孫因爲在國史館多年，主修儒林等傳，熟悉相關檔案，故所言多有根據：

道光甲辰（1844），方俊、蔡宗茂為提調，另行刪并，去表字出處，復收朱鶴齡、閻循觀、汪紱三人，即坊間所刻四傳是也。⁴⁴

⁴¹ 《何紹基詩文集》，頁184。

⁴²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傳稿，編號4945。

⁴³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傳稿，編號8157。

⁴⁴ 〈國史儒林文苑兩傳始末〉，收入《藝風堂文漫存·稿三》，頁17。

據此，兩方小印中，方即方俊，蔡即蔡宗茂，⁴⁵ 他們將原稿中的表字改爲本名，故前述「舊傳」中提到楊雪臣及路安卿處的籤條，有一條將「雪臣」改爲「瑀」，將「安卿」改爲「澤濃」，這些刪去或改動的地方，一一皆與今傳兩卷本相合。⁴⁶ 因此今傳兩卷本已經不是顧莈所進呈的原本，而是方、蔡改定之後的本子。而其刊行的時間便不能早於道光二十四年。

清代國史館成例，每年進呈列傳十六篇。⁴⁷ 不管是何紹基或繆荃孫，皆曾堅定地表示，顧莈的改定本曾進呈皇帝乙覽，故何紹基在前面所引的〈顧先生祠〉詩中說「乙覽大稱善」。

綜合上述：《國史儒林傳》以顧炎武居首是顧莈進呈本的狀況，而兩卷本的內容則是方、蔡的改定本。方、蔡可能因爲擴大編纂儒林傳，把顧炎武移到卷一一，坊間的兩卷本則用了顧本的順序，但用了方、蔡本的內容。

三．

從阮元到顧莈，也就是從嘉慶十七年到嘉慶末，政治空氣當然已經有所變化。顧炎武死後，其遺書文稿均被外甥徐乾學（1631-1694）兄弟取走，祕不示人，恐即害怕其中內容觸犯忌諱。乾隆年間大規模的禁書運動中，顧炎武集被列爲禁書，出現在多種禁燬書目中，乾隆四十三年（1778）范起鳳的案子，其罪狀便是收藏了顧炎武的文集。⁴⁸ 阮元處理他的案子，不能不更加小心翼翼。如果我們對照前面所引《水窗春嘯》中嘉慶對偶犯忌諱者之震怒，多少可以看出當時處理這類問題仍處在模糊、緊張的狀態。道光一朝對言論的箝制比嘉慶朝鬆弛，所以不再需要像阮元那樣大費心思以顧棟高居首。至於顧莈爲何以顧炎武居首，從目前所能見到的資料還找不出確切解答。顧莈是顧炎武的小同鄉，我們只知道顧

⁴⁵ 繆荃孫這段話應是有根據的。方俊是江蘇江寧人，道光十六年進士，授編修，故道光二十四年時爲國史館提調，是合理的。方俊之履歷，見錢仲聯，《清詩紀事》（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第14冊，頁9975。

⁴⁶ 不過臺北故宮的方、蔡改定本，將顧炎武傳列於卷一一的第一位，與坊間兩卷本不同。

⁴⁷ 朱師轍，《清史述聞》（臺北：樂天出版社，1971），頁198。

⁴⁸ 華忱之，〈關於顧炎武的蔣山傭殘稿〉，《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174。關於查禁《日知錄》、《顧亭林詩文集》一事，見雷夢辰，《清代各省禁書彙考》（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頁113-114。范起鳳家藏《顧亭林集》案，見郭成康、林鐵鈞，《清代文字獄》（北京：群眾出版社，1990），頁356。

莼在史館以秉筆直書聞名。嘉慶初期，史館寫和珅（1750-1799）的傳記時出現了兩種不同的寫法。由於清高宗曾經數次公開責備和珅，一種寫法是掩蓋不提，一種是顧莼的秉筆直書，但史館進呈的是前一種版本，仁宗閱後大怒，認為史官有意為和珅掩飾，史館才又將顧莼的本子上呈，因而得到仁宗的讚譽。這一件秉筆直書的故事載在《清實錄》，後來道光帝偶然讀到《仁宗實錄》，遂刻意提拔顧莼為侍講學士。⁴⁹

這裡有必要簡單介紹一下顧莼。顧莼是江蘇吳縣人，嘉慶七年進士。在北京官場中以耿介、直言著稱，而且以工書畫聞名。嘉慶九年（1804）北京京官組成宣南詩社，顧莼即為最初成員之一，他與徐松、陶澍等經世派亦相熟。我們通讀顧莼的《思無邪室遺集》，⁵⁰並未見到與《國史儒林傳》相關的內容，在該書卷四中有〈顧亭林先生傳〉一篇，撰寫的形式是國史館傳中每段話皆有案據的體例，可以判斷也是他所纂的國史館本傳。國史館常常一人有許多篇傳記，而顧莼這篇傳與《國史儒林傳》中之亭林傳不同。顯然兩卷本《國史儒林傳》的編刊者決定仍大體維持阮元的《傳稿》的規模，而不取顧氏這一篇，但由他特意為顧氏寫傳，加上與阮元相稔，可能熟悉阮氏的本衷，故他取顧傳為首上奏之舉似乎並不意外。這樣一位以秉筆直書聞名的史官，在平情衡量過《儒林傳稿》中的實際內容後，決定調動顧棟高不合理的位置，並將「國初稱學有根柢」第一名的顧炎武放在儒林傳之首，並不太令人意外。不過，我在通讀《思無邪室遺集》之後，仍未見到任何進一步的線索，可以說明他如此更動的理由。

阮元的《儒林傳稿》雖有刊本，而且不只一種，⁵¹但是直接提到此書的人很少。值得注意的是，張穆（1805-1849）於道光二十三年刊行的《顧亭林先生年譜》後面所附《國史儒林傳》中的〈顧炎武傳〉，即是出自《儒林傳稿》，但卻題為「《國史儒林傳》」。它應是何紹基道光末期與修史職，自國史館抄錄的。相較於《儒林傳稿》的隱晦，兩卷本則較為流通。道光朝以後，人們所提到的，幾乎清一色是兩卷本的《國史儒林傳》。

⁴⁹ 謝鴻軒「謝述德堂鴻軒氏藏名賢翰墨」（光碟版）中有一件題為顧莼給「竹盦親家大人」的顧莼書信，上面寫「上閱仁宗實錄，故有此超擢」。

⁵⁰ 顧莼，《思無邪室遺集》（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道光十九年刊本）。

⁵¹ 除了南京圖書館所藏本之外，依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983），《儒林傳稿》還有兩種刻本，一是《榕園叢書》續刻（1885）中的本子，一是道光中甘泉黃奭的《知足齋叢書》；見該書第1冊，頁173，195。但《叢書集成三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中的《知足齋叢書》，並無阮稿。

兩卷本《國史儒林傳》的成書過程已如上述，它牽涉到與顧祠會祭有關的兩個問題。

正如我在文章一開頭所提到的，何紹基、張穆等人發起顧祠會祭時，很重要的一個動機是因為阮元的《國史儒林傳》以顧炎武為首，而且這個說法一再地被複述（尤其是參與顧祠會祭者的詩文中），這一點本文一開始所引何紹基的〈顧先生祠〉詩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何紹基在史館的時間是從道光十九（1839）至二十九年，他在詩中說「洎與修史職，讀傳生嘆羨」，表示他在史館時曾經見過《傳稿》。當時讀此傳的不只何氏一人，許瀚（1797-1866）〈龍泉寺檢書圖記〉中說他見到「龍泉寺檢書圖」時，「恍遇先生（阮元）於楮墨間，又不啻昔之讀顧先生傳也」。⁵² 但是何紹基並不知道把顧炎武定為儒林傳首的不是阮元。

何紹基於道光十六年中進士，尋選授庶吉士，入庶常館學習，當時阮元與穆彰阿是教習，何氏深為阮元所欣賞，他和阮元、許瀚等常見面討論金石。阮元於道光十八年五月致仕，何紹基有序送他歸里。阮元從道光十八年離京到二十九年病卒之前都住在南方，此間阮、何二人似只見過一次面，即道光二十年何紹基扶父柩過揚州，請阮元為其父撰神道碑銘，此外未曾見面。⁵³ 由上面的年歷可以看出，從道光十八到二十九年，阮、何只有一次短晤，而何紹基等人起意為顧炎武建祠是在鴉片戰爭之後，後於阮、何二人最後一次見面，則何紹基誤以為阮氏以顧亭林為儒林之首，似乎可以理解。

我不無驚訝地發現，前引的〈顧先生祠〉詩，與收入《東洲草堂詩鈔》中的內容有所不同。《詩鈔》由何氏刊於同治六年（1867），⁵⁴ 它說：

儀徵實後至，草創儒林傳。論學采源流，全編有冕弁。奏御當先皇，乙覽大稱善。

《詩鈔》把「諸儒始相驚」一句改為「奏御當先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乙覽大稱善」之下的雙行夾注——由「阮師撰《國史儒林傳》，以先生居首」，後來改為：「阮師撰《擬史館儒林傳稿》，以先生居首，至嘉慶初年，顧丈莼據稿立傳，進書時即依原次。」⁵⁵ 前者是「撰《國史儒林傳》」，後者改成「撰《擬史

⁵² 許瀚，〈龍泉寺檢書圖記〉（北京圖書館藏殘稿）；轉引自王章濤，《阮元年譜》，頁915。

⁵³ 王章濤，《阮元年譜》，頁903-960。

⁵⁴ 《何紹基詩文集》所附〈年譜簡編〉，頁1134-1135。

⁵⁵ 《東洲草堂詩鈔》（收入《何紹基詩文集》），頁184。

館儒林傳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後面加的一段話，即「至嘉慶初年，顧丈純據稿立傳，進書時即依原次」。前文已指出此處的嘉慶初年顯然錯誤，因為阮元的《傳稿》成於嘉慶十七年。顧莈進呈較可能發生在嘉慶末年。從這些微妙的改變可以看出，何紹基在道光二十四年後發現《儒林傳稿》中關於顧炎武的位次另有曲折，故他的〈顧先生祠〉詩前後表述有所不同。

四・

在清理這一段公案時，出現了不少疑點。前面已經提到，何紹基與阮元非常熟悉，何氏在詩文中總是自稱為阮元的門生，而且他們的交往是在《儒林傳稿》完成之後，他為何不了解阮元在《傳稿》中所作的安排？況且何紹基本人從道光十九至二十九年（1849）有將近十年時間在史館工作（其間曾幾度出典鄉試），寫〈顧先生祠〉詩時，人也是在史館，目前所存的何紹基日記，便有當時纂輯國史列傳的記錄，⁵⁶ 何以他對阮元的《傳稿》及後來顧莈改動進呈等情實卻懵無所知？而且，《儒林傳稿》當時可能已有抄本，道光二十四年的《顧亭林先生年譜》即收入了其中顧炎武一篇，而且其他收入《傳稿》中的傳狀者都清楚知道這是《擬國史儒林傳》，何以何紹基等人卻忽視「擬」這個字？前面提到《東洲草堂詩鈔》中的〈顧先生祠〉詩對雙行夾注作了修改，但何以仍說阮元擬傳是「以先生居首」，而顧莈據稿立傳，「進書時即依原次」？這個公案究竟應該如何解釋？從目前所掌握的文獻資料當然沒有辦法得到確解，以下只是一些推論。

首先，當阮元纂《儒林傳稿》時，知識界對於顧炎武的評價並無定論，在阮元友人中即有持貶抑意見之人，如江藩（1761-1831）的《漢學師承記》，該書成稿時間約為嘉慶十六、七年，與《儒林傳稿》相較，⁵⁷ 書中不但把顧炎武放在最後一卷，而且藉著答客問的方式透露一些他對顧炎武、黃宗羲的不滿：其一，

兩家之學，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漢學為不可廢耳，多騎牆之見，依違之言，豈真知灼見者哉！

其二，

不順天命，強挽人心，發蛙黷之怒，奮螳螂之臂，以烏合之眾，當王者之

⁵⁶ 何紹基，《何紹基未刊日記》，道光二十三年部份，收藏於湖南省博物館，承陳松長先生影印寄示。

⁵⁷ 汪喜孫為此書所作的跋寫於嘉慶十七年。

師，未有不敗者矣。逮夫故土焦原，橫流毒浪之後，尚自負東林之黨人，猶效西臺之慟哭，雖前朝之遺老，實周室之頑民，當名編薰胥之條，豈能入儒林之傳？

一條是學術的，一條是政治的。江藩接著說，顧、黃二人之所以能勉強放入全書的最末一卷，全因受到乾隆《御批通鑑輯覽》中對於明遺民烈士的寬大處理方式的影響，⁵⁸ 以上幾點，透露出時代空氣中，除了不滿意顧、黃二人的學術之外，政治忌諱依舊是一個不能完全去除的因素，江藩答客問的最後幾句，正是引用乾隆來合法化自己，這種手法在當時非常普遍。

阮元處理誰應居儒林傳首這個問題時顯然經過再三考量。咸豐四年（1854），伍崇曜（1810-1863）跋《漢學師承記》時說：「鄭堂（江藩）久在阮文達幕府，文達撰《國史儒林傳稿》，第一次顧亭林居首，第二次黃梨洲居首。」⁵⁹ 伍氏之說想必不是空穴來風，阮元對清朝第一本儒林傳中應該把誰放在第一的問題必然有過一段醞釀期，而且到處與人談論，故與他熟悉的人知道阮元在顧、黃二人之間徘徊。但是在將《傳稿》交付史館時，卻又考慮到政治忌諱的問題，所以他也像江藩一樣，引一段乾隆的上諭，依功令刻意將顧棟高調到最前面，後來顧藹調動次序，改以顧炎武居首，應是阮元原來想作而最後未作的。由此或可以窺見嘉慶末年以後政治尺度日漸寬鬆之實況。

何紹基在入史館前顯然沒有見過《儒林傳稿》的稿本或刻本，所以才說「洎與修史職，讀傳生嘆羨」，表示他先前未曾讀過。我推測，他在道光十九年進入史館之後，始終犯了一個關鍵錯誤，誤以為他在史館所見到的儒林傳便是阮元留存的原本，而不知道他所見到的其實是顧藹重新排定次序進呈過的本子，而阮元在道光十八年已致仕離京，故無從質正。因此何紹基在道光二十三年〈顧先生祠〉詩中敢說「洎與修史職，讀傳生嘆羨」，強調「阮師撰《國史儒林傳》」，而不是「《儒林傳稿》」。他也誤以為阮稿當時即已進呈嘉慶皇帝，所以詩中說「乙覽大稱善」；而且當時張穆所編《顧亭林先生年譜》收入顧氏本傳時也堂而皇之地稱之為「《國史儒林傳》」。

他在道光二十三年以後的某一時間，開始知道這件事別有曲折，所以〈顧先生祠〉詩後來收入《東洲草堂詩鈔》前作了改動，但是從改動之後的版本看來，

⁵⁸ 江藩，《漢學師承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頁135-136。

⁵⁹ 同前書，頁151。

他仍然誤以為先前所見到的《傳稿》及排序即是阮元的舊貌，不過後來知道該稿曾經顧藹進呈，因此〈顧先生祠〉詩的新版有幾個新元素：一，他把「諸儒始相驚」改為「奏御當先皇」。二，他加上了嘉慶初年，顧藹即依阮稿進呈。三，他把「阮師撰《國史儒林傳》」改為「阮師撰《擬史館儒林傳稿》」。但是有一個基本元素仍然未變：他仍主張阮元以顧炎武居首，而顧藹進呈時即依原定次序。

同時我們也應注意，道光二十三年何紹基、張穆等人籌建顧祠、修撰顧亭林年譜等活動熱烈進行時，他們抄來的顧炎武本傳即是阮元《傳稿》中的原本，後來兩卷本《國史儒林傳》，所刪去的部份（如「明贊善紹芳孫」）都還保留著。道光二十四年，方俊、蔡宗茂修改經顧藹進呈的儒林傳時，主要刪去引用書名及表字，並對內容作輕微的改動，但這些都是細微末節，不影響儒林傳為阮傳之印象。

此處牽涉到與顧祠會祭有關的第二個公案。何紹基在發起顧祠會祭時一再宣稱當時學界大宗師阮元已經有一篇〈祠記〉很快就會寄來，故〈顧先生祠〉詩中說「阮相國師〈記〉文尚未寄到」。⁶⁰ 但是阮元的文集及其他傳世材料中，卻見不到這篇重要文字。北京圖書館所藏的《顧祠小志》前有一篇董康（1867-1947）的序文，認為此文始終未曾寄到。董康推測當時阮元已經老邁，所以未能成文。⁶¹ 在顧祠祭開始時，阮元已經退休家居，確實常請人代筆，但是自成的文章仍然不少，衰老而艱於為文恐非實情。

前述兩個公案有一個共同的特質，即阮元始終在猶豫中。對於是否正式把顧炎武擺在第一位常在游移中，對於如何為顧炎武的形象定調，也處於猶豫狀態。阮元當然推崇顧氏，《皇清經解》即從《左傳杜解補正》一書開始，但究竟是不是完全同意顧祠發起者們的宗旨？

阮元的這篇〈祠記〉事實上存在，並收入劉師培（1884-1919）《左龔題跋》中，而為陳鴻森所輯錄。劉師培為這篇〈祠記〉加了一段案語：

案：芸台先生此文作于道光二十四年後，時《學經室集》已刻成，未及增入，今檢出先生原稿，因亟錄之，以補《學經室集》之缺。⁶²

⁶⁰ 《顧亭林先生年譜》，頁113。

⁶¹ 董康，〈序〉，吳昌綬，《顧祠小志》（北京：北京圖書館藏民國十一年〔1922〕木刻本），頁1。

⁶² 劉師培，《劉申叔先生遺書》（臺北：京華書局，1970），第4冊，頁2240。

劉師培說明所據為阮氏「原稿」，疑是此稿原存於劉家，蓋劉師培為劉文淇曾孫，阮元晚年致仕返里，劉文淇以鄉里後進時相過從，故劉文淇《青溪舊屋文集》中頗有為阮元代筆之作，劉家頗存鄉邦故老的遺稿，故《劉申叔先生遺書》中有不少揚州地區人物的手稿及外人所罕知的事蹟。⁶³

首先，文章的主調與阮元的〈顧亭林先生肇域志跋〉⁶⁴是一致的，不滿當時有一大批人推崇顧氏的經濟之學勝於經史之學，阮元認為那是錯誤的，說「徒以經濟贊頌者，非篤論也」。阮元先前跋《肇域志》時說：

故世之推亭林者，以為經濟勝於經史，然天下政治隨時措宜，史志縣志，可變通而不可拘泥，觀《日知錄》所論，已或有矯枉過中之處，若其見於設施，果百利無一弊歟？《四庫書提要》論亭林之學，經史為長，此至論，未可為腐儒道。⁶⁵

語氣激烈直截，認為顧氏經濟之論多矯枉過中，不切實際，甚至諷刺大力推闡顧氏經濟之學者是「腐儒」。〈祠記〉中的語氣雖然比較委婉，但是仍然帶有濃厚的勸告意味。他與何紹基、張穆等顧祠的創建者懷抱有所不同，何、張等人認為顧氏兼包經史與經濟，在〈顧先生祠〉詩中，何紹基說，顧氏「經心執聖權，首啓熙朝彥，兵刑禮樂尊，九數六書衍，漢宋包群流，周孔接一線」。又說「先生冠儒林，狂瀾植厓堰，君親鑒吾身，學行須貫穿，願從實踐入，敢恃虛談便」。⁶⁶而張穆的顧炎武年譜的〈序〉中也說：「而洞古今，明治安，學識賅貫，卒亦無能及先生之大者。」⁶⁷

接著還有一個問題：阮元的〈祠記〉是不是曾經寄發？如已寄發，何、張諸人為何隻字不提？

阮元逝於道光二十九年，上距顧炎武祠之落成還有若干年，他如果願意寄發〈祠記〉，時間相當寬裕。我推測阮元未將〈祠記〉寄發，主要原因是他與顧祠

⁶³ 其中阮元的三封信，即「敝紙數頁，存于先人舊篋」；見《劉申叔先生遺書》，頁2239。在《左盦題跋》中，還有阮元其他篇什。此文題為〈京師慈仁寺西新立顧亭林先生祠堂記〉，收入陳鴻森，〈阮元學經室遺文輯存（二）〉，《大陸雜誌》103.5 (2001): 38。

⁶⁴ 阮元，〈顧亭林先生肇域志跋〉，見《學經室三集》（收入《叢書集成簡編》，第589冊），卷四，頁627。

⁶⁵ 〈顧亭林先生肇域志跋〉，《學經室三集》卷四，頁627。

⁶⁶ 《顧亭林先生年譜》，頁113-114。

⁶⁷ 同前書，〈序〉，無頁碼。

會祭人物之間看法仍然有所出入，他在〈祠記〉中一上來就先反駁「世之推亭林者，以爲經濟勝於經史」，而且強調「先生之經濟，皆學術爲之」，不欲後進徒空言經濟，而不根柢於學。在這篇〈祠記〉中有兩個明顯的重點：第一，阮元認爲顧氏之學以經史爲長，經濟方面多不切實際，當時人只贊頌其經濟之學，並非篤論。第二，阮元認爲經濟要根柢於學術。第二點與何紹基、張穆的看法相近，但第一點則與當時士人之論顯然有出入。阮元當然是非常推崇顧炎武的，他綜合了《四庫提要》中的評語，高度推崇顧氏的學術。在考證學如日中天的當時，他們所重視的是顧氏考證方面的業績。但是乾隆末年以來，隨著社會、政治、經濟問題的惡化，有另一種顧炎武崇敬在緩緩崛起，它突出的是顧氏的經濟面。當時持這方面議論的人很多，譬如，孫星衍《平津館文稿》卷上〈呈安徽初撫部書〉說：「又顧寧人先生所撰《天下郡國利病書》，是未就之稿，如增補成書，實爲經濟要務。」⁶⁸ 又如李兆洛說「（《日知錄》）中言時務八卷，此爲有用，乃全書之精華，亭林所云，爲王者取法者也」。⁶⁹ 而道光六年魏源編成的《皇朝經世文編》收了顧炎武九十幾篇文章。由阮元的遲疑不寄，可以看出兩種顧炎武形象之間的出入，此後顧炎武形象的轉變，事實上也就與清代中期經史考證不再壟斷全局，出現了鬆動，多元的聲音開始隱然萌現，思想世界出現了由重考證向「經濟」、「明道救世」傾斜的新動向有關。當然，顧祠會的人還刻意突出顧炎武的忠孝、氣節，來針砭嘉、道年間的官場與士習，對此，我將另作討論。

五・

《國史儒林傳》以顧炎武居首，代表有清一代儒者的全神堂位次的確立。清代嘉、道年間是學術全神堂開始變化的時刻，乾嘉考據仍然盛行，但它作爲唯一權威的地位開始出現雜音，有一些新的學問起來爭衡，不同版本的全神堂的安排即是這種表示，此處僅以顧炎武在幾種不同的全神堂中的位次說明之。

嘉、道年間代表考證學正統派的全神堂是江藩的《漢學師承記》，《師承記》的成書，至遲應在嘉慶十六年十月至翌年五月之間。⁷⁰ 在他排定的全神堂中

⁶⁸ 孫星衍，《孫淵如先生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頁268。

⁶⁹ 蔣彤，《清李申耆先生兆洛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道光十三年錄，頁147。

⁷⁰ 陳祖武，《中國學案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頁221。

專治考證的學者佔有最核心的地位，為首的是閻若璩（1638-1704）、胡渭（1633-1714）、張爾岐（1612-1678）、馬驥（1620-1673）等人，而治染佛學或宋明理學者，或排斥、或處於邊緣地位。⁷¹ 在江藩的全神堂中，仰慕朱子的顧炎武及受陽明心學影響的黃宗羲只居最末一卷，前面說過，江藩除了不滿他們的學問外，還責備他們在明清易代之際，「不順天命，強挽人心」。⁷²

道光年間出現了一波重整全神堂運動。這個運動顯然與嘉、道年間內、外動亂有關，故激盪士人世界提出新的標準來評價本朝儒者，唐鑑（1778-1861）《清學案小識》是其代表。《清學案小識》自道光二十三年開始撰稿，成稿、刊行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夏。這一個新全神堂的安排宗旨非常清楚：「天下之患，莫大於不顧防檢，不敦節概，不修禮義廉恥，不遵規矩準繩。……」而認為「還吾程朱真途轍，即還吾顏曾思孟真授受」。⁷³ 故完全以程、朱理學為評判位次的中心，全書依序是「傳道學案」、「翼道學案」、「守道學案」，然後是「經學學案」、「心宗學案」，為首的是陸隴其（1630-1692）、張履祥（1612-1674）、陸世儀（1611-1672）等人，顧炎武則在「翼道學案」中分得一席。

另外一個全神堂是《國史儒林傳》。前面已經提到，它經歷了一個發展的過程，從嘉慶中期的《儒林傳稿》，到嘉慶末顧藟重定次序。顧炎武由原先的位居第八，到後來居於清朝儒林之首。在三種嘉慶到道光的全神堂位次中，顧炎武在《國史儒林傳》中得到最高的評價，以致道光二十三年，以何紹基、張穆為首的一群京官，以儒林傳中顧氏為首作依據，在北京慈仁寺建顧炎武祠，聯合同志進行祭拜，這個崇拜行動一直延續到清末民初，超過七十年的時間。這是相當不尋常的舉動。

道光年間，顧炎武仍舊是一個敏感的名字，參與顧祠祭的魯一同（1805-1863）在回顧當日情景的一首詩中這樣寫：

朝士或不與，與者疑登仙，以茲盛傳播，亦復遭譏彈。⁷⁴

⁷¹ 方東樹在《漢學商兌》認為，清代考證學者反對宋代理學的激烈程度甚至到「使有宋不得為代」；見朱雅，〈漢學商兌題辭〉，收入方東樹，《漢學商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頁1。

⁷² 《漢學師承記》，頁135。

⁷³ 唐鑑撰輯，《清學案小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敘〉，頁213。

⁷⁴ 魯一同，〈四月三日同人祀顧亭林先生於報國寺遂為展禊之會賦五十韻〉，《通父詩存》（見《通甫類稿》〔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無出版年代，第368冊〕），卷四，頁15。

它說明不少京官不敢或不願涉足參加祠祭，孫衣言（孫詒讓之父）也在顧祠祭的題名卷子上記下當時的實況：

始顧先生祠初成，余實在京師，予友孔繡山、葉潤臣、朱伯韓，屢要予一拜先生，予未敢往也。⁷⁵

甚至到了光緒十年（1884），當陳寶琛（1848-1935）提出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從祀孔廟時，我們還見到這樣一條史料說禮部尙書畢道遠（1810-1889）「發憤語諸司曰：三人學問，我所不知，但以品行言，二人在康熙時皆抗不出俗，尙得從祀耶？」⁷⁶

前面所引的材料告訴我們，在清代前期的顧炎武不但不是第一大儒，而且是一個忌諱人物。但是他在全神堂中的地位正默默地改變著。到了嘉慶、道光年間，一群讀書人逐漸塑造出一種顧炎武崇拜，它強調漢宋兼採、強調學問與經濟並重、強調明道救世之學。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人們正在逐步突破清代前期的政治忌諱。《國史儒林傳》收入顧炎武、王夫之（乾隆年間王夫之有九種書被查禁）等有犯忌諱的人，並給予很高的位置，多少反映了清代文網箝制力量的鬆弛。《國史儒林傳》也合法化了一些原先觸犯政治忌諱的人物，觸發了紀念或其他文化活動，道光二十四年的北京京官爲顧炎武建祠，乃至道光二十至二十三年（1840-1843）湖南鄧顯鶴（1777-1851）主持刊印的王刻本《船山遺書》，⁷⁷ 都與這個新全神堂的安排有分不開的關係。

六．

清代國史館成稿一向存檔，並不刊刻，那麼我們所見到的儒林傳，是如何出現的？當時人動輒說《國史儒林傳》如何如何，又是怎麼知道的？

嘉慶年間的錢儀吉（1783-1850）說國史館的列傳「外人弗得而見，曩承乏會典之役，幸獲展觀，亦不敢稍有寫錄」。錢儀吉因爲參與會典的修纂而得以見到

⁷⁵ 《顧先生祠會祭題名第一卷子》（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光緒年間刊本），同治七年條，頁37。

⁷⁶ 見李慈銘，《越縕堂日記》，頁305；轉引自翁同龢等記，《近代人物志》（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0），馬蔚林條。

⁷⁷ 見劉志盛、劉萍，《王船山著作叢考》（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28-35。

國史館的傳記，卻未敢抄錄向外流傳。⁷⁸ 同治年間，李元度（1821-1887）編《國朝先正事略》，序上也抱怨草野之士無由獲睹國史館傳。⁷⁹ 李桓編《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年代稍後（始於同治六年〔1867〕，成於光緒十六年〔1890〕），他在〈述意〉中說該書的材料來源：「本人有國史館本傳者，均將史傳首列，次及諸家文字。惟史館故事，止准史官就館抄錄，不得將原本攜歸私寓，先文恭公，先編修兄迭直史局，均不過二、三年，就鈔無多。嗣屬在館戚友續鈔，仍屬無幾，是以應有史傳而闕載者甚夥，海內故家如將先世傳本鈔寄，當歸補編。」⁸⁰ 由此可見史館列傳一般不能得見，史官也不可攜回私寓，但是可以就館抄錄。李桓書中國史本傳的數量其實已經很大，那是他父兄兩代及他本人陸續請託在館戚友抄錄所得。

清代從史館抄輯列傳成稿並加刊刻的例子並不在少，乾隆、嘉慶間《滿漢名臣傳》等書即是。這類書的出版者往往並不明顯，有時不具名或是安上一個化名，而出版者亦多不掛名，或掛上廠甸書舖的名字。

另外也有一種情形，即抄錄國史館本傳但並不出版。馮爾康見過一種《清人傳記·志銘·雜文鈔》，內有浙江沈炳垣「校讀于崇明官舍」字樣。他又見過寧波徐時棟所藏鈔本《滿漢列臣傳》，上面有徐氏於同治五年（1866）整理時所寫題記，說道：《滿漢名臣傳》有印本，但《列臣傳》不知有無印本，「將寫札與都中故人問之」。又講到該本缺四卷，有些史實弄不清楚——「俟問故人之在史館者當知之也」。由此可知從史館抄輯各種列傳是當時常見之事，而且國史館傳記抄出流傳的數量相當之多。⁸¹ 一直到清末民初，書商仍然大量從史館抄出印行，如卷帙龐大的《清史列傳》，便是清末中華書局僱人長期抄寫的成果。⁸² 而國史館經費之困窘，可能是允許書商付錢抄輯館傳出版的原因之一。⁸³

⁷⁸ 錢儀吉，《碑傳集》（收入《清代碑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序〉，頁1。

⁷⁹ 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長沙：岳麓書社，1991），頁1。

⁸⁰ 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第127冊），〈述意〉，頁6。

⁸¹ 以上見馮爾康，《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頁48, 50, 51。

⁸² 王鍾翰，〈我和清史列傳〉，《清史續考》（臺北：華世出版社，1993），頁364。

⁸³ 關於清代國史館待遇之薄、經費之窘，參見喬治忠，〈清代國史館考述〉，頁186。

國史館本傳擁有很高的權威，所以編書的人常常強調某某篇「依國史抄錄」或申明為「國史館原本」。⁸⁴ 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的〈述意〉中便一再聲明私家傳狀不如國史本傳，⁸⁵ 故何紹基〈顧先生祠〉詩中強調他見到國史館的顧炎武本傳時感覺，「元氣入人心，史筆非私擅」。

兩卷本《國史儒林傳》極可能是史館人員抄錄之本，展轉傳抄，為廠肆書賈所得，故私印之，以滿足學界殷望。⁸⁶ 而一旦刻印，一般讀者即逕奉為官方定論。官版的全神堂很快就取得優勢，超過其他私人纂述，如江藩《漢學師承記》、唐鑑《清學案小識》等書，創始顧祠會祭中的何紹基等人便抓緊這一點，到處宣揚「先生（顧炎武）冠儒林」。

我們決不能以辛亥革命以後的觀點去想像清代官方文化權威的力量。從康熙以來，能得到皇帝的青睞，不管是著作得以進呈御覽（如胡渭的《禹貢錐指》、朱尊彝的《經義考》）、蒙皇帝賜匾，或是其他今人看來微不足道的賞賜，都是無上的榮耀。⁸⁷ 趁著康熙南巡，在運河兩岸跪迎，希望呈書獻詩的例子不勝枚舉。康熙四十二年（1704）胡渭詣行在獻〈平成頌〉及所著《禹貢錐指》，皇帝特書「耆年篤學」四大字賜之。當康熙到淮安時，因為近臣的推薦，皇帝傳旨召見閻若璩，但因御舟前進的速度太快，等閻若璩趕到的時候，已經不能面見天顏，閻氏大失所望，他念茲在茲希望像胡渭一樣求得御書的渴切之情，真是難以形容。後來皇四子胤禵傳諭：「聞先生志求御書，盍不自來館我齋中，皇上萬幾之暇，我得乘閒代先生請。」諭到，閻氏正值小恙，竟霍然而起，然後趕赴北京住在王府等待，未幾而卒。他在死前對兒子說：「夫人有生必有死，何足悲。但此來御書未得，賢王崇禮未得報稱，汝當謹銜吾訓，服任遂功，亦歸語諸子若孫，皆志吾志。」⁸⁸

從乾隆中期以降，士人世界有三份指導性的文獻，第一是乾隆四十一年年的《勝朝殉節諸臣錄》，它重估拒清殉明者的歷史地位，並宣示節義是一個重要的標準。這份文件也提供了一道擋箭牌，使得許多禁燬或長期藏匿的殉節諸臣的著

⁸⁴ 馮爾康，《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頁48。

⁸⁵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述意〉，頁6。

⁸⁶ 上海圖書館藏抄本《儒林傳擬稿》一卷，有秦更年跋，跋語中說，聞兩卷本《國史儒林傳》乃廠甸所刻，但他從未見其書；見王章濤，《阮元年譜》，頁555。

⁸⁷ 而皇帝對學問也表示相當的興趣，康熙指名購進馬驥《釋史》的書校印是一例；見張穆，《閻潛邱先生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頁104, 120。

⁸⁸ 同前書，頁122, 124。

作，在修改之後得以流傳，那些書籍常在書首安放乾隆的諭旨作為護符。第二份有力的文獻是《四庫提要》，只要留心清代中期以後的著述，便可以發現它如何深入影響士人們知識世界的圖像，如何設下了一個穩當的標準。在道光以後，出現的第三份文獻即是《國史儒林傳》，它被一再稱引，成為儒林全神堂。前兩件文獻是官方頒布、印行，第三份文獻雖經御覽，但卻是由民間的書商所刊印。

問題接著而來，究竟誰是「官方」，誰是「民間」？「官方」與「民間」是截然兩分，還是有色彩濃淡的差異？在以上三份文獻中，第一份出自乾隆個人的意旨，第二份是四庫館臣通力合作，最後由皇帝「欽定」，第三份基本上是出自阮元、顧莈等人之手，最後經過皇帝欽定，官方有時是皇帝，有時是士大夫與皇帝的合體。在《國史儒林傳》的案例中，我們看到阮元作為一個大官，自願修《國史儒林傳》，在編纂過程中，用心採集了學界的公論，他可能認真想過要以顧亭林為傳首，但他的傳稿還要通過國史館層層的審檢才可能進呈欽定，而他必須先猜測這幾道審檢的可能標準，預作自我過濾。

另外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官方的權威究竟如何發揮影響？有很多時候恐怕是靠著人們對它的推測與想像。以本文的討論為例，清代國史館的列傳照例不印，那麼它如何流通，又如何產生影響力？似乎一旦被宣付國史館立傳，即使傳本只是貯存在國史館內，一般人無法讀到，仍然可以產生很大的權威；也就是說傳統中國官方權威的實際運作情形相當複雜，值得進一步探討。

清光緒六年（1880），繆荃孫奏請派員重修儒林傳，這一次重修本中，徹底打散兩卷本對先賢的安排，上卷為講學，下卷為經學，黃宗羲、顧炎武落在下卷，而且黃在顧前。⁸⁹ 不過這個新版本顯然未能取代前面一個官方全神堂在士人心目中的位置。全神堂是複數的，孔廟與《國史儒林傳》位階便有所不同，前者是萬世之典，後者是一代之書，內容未必一致。在我們討論的這一個個案中，《國史儒林傳》的全神堂的位次與孔廟並不一致。孔廟作為官方全神堂最高階的代表，黃道周（1585-1646）、孫奇逢、張履祥、陸世儀早已入祀孔廟——黃道周在道光五年（1825）、孫奇逢在道光八年（1828）、張履祥在同治十年（1871）、陸世儀在光緒元年（1875）入祀；然而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在《國史儒林傳》位居前列的人，卻一直要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才得入祀孔廟。兩者相比，便可發現其不一致，也可以發現在所謂「官方」之中兩個陸塊正滑移開來。

⁸⁹ 這個安排恐怕在此之前史臣已經在醞釀了。

結論

本文主要是藉《國史儒林傳》成書過程及顧炎武學術地位的轉變，來探討嘉、道年間思想文化歷史中，官方意識形態、學術、思想、社會幾種力量互相交織、轉變的情形。茲簡略撮述文中要點如下：

一，道光二十三年，北京一群京官建立了顧炎武祠，並定時會祭，這個會祭活動一直持續到民國初年，前後參與者多達數百人，而且多為道、咸以來的菁英。但是在清初「三大儒」或「四大儒」的名目中並沒有顧炎武的名字，故本文一開始是以顧祠的建立為引子，討論了阮元《儒林傳稿》修纂的過程，重新檢討清代官方以顧炎武為清朝第一儒者的論斷是如何形成的，同時也討論了在形成顧炎武崇拜的過程中，士大夫圈中的傳說、期望等，情緒交雜其間，編織了一個似有若無的「全神堂」的情形。

二，本文考證了阮元是否曾為顧祠撰寫〈祠記〉的疑案，認為這篇〈祠記〉已經寫成但似未寄出。而從這個公案中，可以看出道光中期兩種顧炎武形象之間的推移，一種是純粹的經史考證，一種是結合經史、經濟以明道救世，這個現象其實反映了當時士人兩種學風的競逐，阮元與他的下一代之間分別代表兩種理想。明道救世的一派漸漸勝過了經史考證的一派，而阮元遲遲不肯將〈祠記〉寄發，即表示他與倡建顧祠的那一群京官們所表達的新動向，看法有所出入。

三，本文試著釐清《國史儒林傳》形成的過程。這部書面目相當模糊，既無編者，亦無出版者，卻標明為「國史」，且逕視為阮元所纂。但是阮元所纂的是《儒林傳稿》，並不是《國史儒林傳》。然而從另一方面說，《國史儒林傳》是以《儒林傳稿》為基礎改修而成，故本文的結論是：一般認為兩卷本《國史儒林傳》是阮元所纂，這是錯誤的。阮元所纂是《儒林傳稿》，但是兩卷本《國史儒林傳》雖非阮元所纂，其內容大幅承襲了《儒林傳稿》，所以人們籠統地稱之為阮撰也是有道理的。

四，顧祠會祭發起人到處宣稱他們發起顧炎武崇拜的主要根據是，因為官方的《國史儒林傳》以顧氏為清朝儒者第一。實則阮元的《儒林傳稿》中並未以顧氏居首，一直到嘉慶末年，顧莼才將他排在清代儒林之首進呈皇帝，後來《國史儒林傳》以顧氏為首的安排才告確定。今傳《國史儒林傳》並非官方所刊印，應是館臣抄錄，展轉傳抄於外，由廠甸書估私印之，但是並未因此減少了它在士人世界的權威地位。

五，本文討論了官方功令、政治忌諱如何影響清代儒者全神堂的安排，並看出從嘉慶到道光，政治忌諱逐步鬆弛的情況，阮元在嘉慶中期纂修《儒林傳稿》，將顧炎武、王夫之等在乾隆年間仍犯忌諱的敏感人物收入，並在行文中推崇顧氏為清初儒者之首，已經是一種突破，但另一方面，他卻非常奇詭地把顧棟高排在卷首，一直到嘉慶末年顧純才調整位次，將顧氏放在首位，從這些細微的變化可以看出，政治忌諱之逐步鬆弛與士人世界相應的變化。

在顧炎武崇拜形成的過程中，阮元轉開了門把，一大群人便衝開大門蜂擁而入。從道光、咸豐兩朝的詩文集看來，崇顧的調子愈彈愈高，成了千人大合唱，以至忘了阮元的猶豫與矛盾。整個發展的過程，反映出當時廣大士人世界顧氏崇拜的動能，當然也反映了時代思潮的新變化。

（本文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通過刊登）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儒林顧炎武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傳稿，編號4945。
- 〈儒林顧炎武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傳稿，編號8157。
- 《國史儒林傳》，大阪：關西大學圖書館藏兩卷本。
- 《顧先生祠會祭題名第一卷子》，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光緒年間刊本。
- 方東樹，《漢學商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 永瑤、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漢京出版事業公司，1981。簡稱《四庫提要》。
- 朱師轍，《清史述聞》，臺北：樂天出版社，1971。
- 江藩，《漢學師承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
- 何紹基，《何紹基未刊日記》，長沙：湖南省博物館藏。
- 何紹基，《何紹基詩文集》，長沙：岳麓書社，1992。
- 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長沙：岳麓書社，1991。
- 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第127-191冊。
- 阮元，〈京師慈仁寺西新立顧亭林先生祠堂記〉，收入陳鴻森，〈阮元擘經室遺文輯存（二）〉，《大陸雜誌》103.5 (2001)：38-48。
- 阮元，《擘經室三集》，收入《叢書集成簡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第589冊。
- 阮元，《儒林傳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997，史部，第537冊。
- 阮常生編，《擘經室續集》，收入《叢書集成簡編》，第593冊。
- 唐鑑撰輯，《清學案小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 孫星衍，《平津館文稿》，收入《孫淵如先生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 孫殿起，《販書偶記》，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4。
- 翁同龢等記，《近代人物志》，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0。
- 張穆，《閩潛邱先生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 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
- 張鑒，《冬青館甲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1492冊。
- 梅鶴孫著，梅英超整理，《青谿舊屋儀徵劉氏五世小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焦循，《雕菰集》，臺北：鼎文書局，1977。
- 黃奭編，《知足齋叢書》，收入《叢書集成三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
- 楊晉龍主編，《汪喜孫著作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
- 董康，〈序〉，吳昌綬，《顧祠小志》，北京：北京圖書館藏民國十一年（1922）木刻本。
- 臧庸，《拜經堂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1491冊。
- 趙爾巽等，《清史稿》，啓功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76-1977。
- 趙翼，《甌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劉師培，《劉申叔先生遺書》，臺北：京華書局，1970。
- 歐陽兆熊、金安清，《水窗春曉》，北京：中華書局，1984。
- 蔣彤，《清李申耆先生兆洛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 魯一同，《通父詩存》，見《通甫類稿》，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無出版年代，第368冊。
- 錢仲聯，《清詩紀事》，全22冊，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 錢泰吉，《甘泉鄉人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1519冊。
- 錢儀吉，《碑傳集》，收入《清代碑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繆荃孫，《國史儒林傳》，收入《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4，史部，第36冊。
- 繆荃孫，《藝風堂文漫存》，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
- 顧莈，《思無邪室遺集》，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道光十九年刊本。
- 龔自珍，《龔自珍全集》，王佩誥校，北京：中華書局，1959。

二·近人論著

上海圖書館編

1982-1983 《中國叢書綜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章濤

2003 《阮元年譜》，合肥：黃山書社。

王鍾翰

1993 〈我和清史列傳〉，《清史續考》，臺北：華世出版社。

王汎森

何冠彪

- 1996 〈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合稱清初三大儒考——兼說清初四大儒及五大儒的成員〉，氏著，《明清人物與著述》，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頁49-63。

周康燮編

- 1978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論集》，香港：存粹學社。

孟森

- 1959 〈清國史館列傳統編序〉，《明清史論著集刊》，北京：中華書局，下冊，頁624-631。
- 1986 〈清史傳目通檢序〉，《明清史論著集刊續編》，北京：中華書局，頁483-488。

林存陽

- 2002 《清初三禮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郭成康、林鐵鈞

- 1990 《清代文字獄》，北京：群眾出版社。

陳祖武

- 1994 《中國學案史》，臺北：文津出版社。

陳鴻森

- 2001 〈阮元擘經室遺文輯存〉，《大陸雜誌》103.5：14-22。
- 2006 〈臧庸年譜〉，《中國經學·第二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喬治忠

- 1994 〈清代國史館考述〉，《文史》（北京）39：181-194。

華忱之

- 1959 〈關於顧炎武的蔣山傭殘稿〉，《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

馮爾康

- 2000 《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雷夢辰

- 1989 《清代各省禁書彙考》，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劉志盛、劉萍

- 1999 《王船山著作叢考》，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謝正光、范金民

- 1995 《明遺民錄彙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The Pantheon of Qing Dynasty Confucians: *Guoshi rulin zhuan* and the Ceremonial Worship of Gu Yanwu's Temple during the Daoguang Era

Fan-sen W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During the Daoguang era of the Qing dynasty (after the Opium War), a large group of officials in the capital Beijing began to hold ceremonial worship in Gu Yanwu's temple. This type of ceremonial worship lasted for seventy to eighty year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emple for Gu Yanwu and the writing of the *Guoshi rulin zhuan*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for re-examining the way in which the view praising Gu Yanwu as the most important Confucian of the Qing dynasty came into being.

The article also examines how this phenomenon related to the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changes during the Jiaqing and Daoguang era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orship of Gu Yanwu, traditional literati circles began to form a quasi spiritual pantheon (*quanshen tang*, 全神堂) delineating the relative position of each Confucian throughout the Qing dynasty. The sequential arrangement of Confucians in order of importance was at times subtle and intangible but nevertheless present. Through the compilation of collections of Confucian biographies, various groups of literati created their versions of the spiritual pantheon which presented Confucians in order of the importance assigned to them by the compiler. The *Guoshi rulin zhuan* was one of these biographies and it presented Gu Yanwu as the most significant Confucian of the Qing dynasty. Official statutes and political taboos also influenced the establishment and arrangement of this kind of quasi spiritual pantheon by Qing dynasty Confucians. The article demonstrates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official ideology, scholarship, thought, and social forces during this period and the transformations resulting from these interactions.

Keywords: *Guoshi rulin zhuan*, Gu Yanwu Temple